

张之洞 与中国近代教育

黄新宪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

黄新宪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1年福州

责任编辑：黄荔国
封面设计：李敏宁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
黄新宪著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大梦山7号 邮编350001)

福建医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24千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7-5334-0930-2/G: 628 定价：3元

目 录

导 论 一个对近代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封建权臣…	(1)
第一章 在尊经书院的早期教育活动…	(11)
一、囿于传统的办学特色…	(11)
二、《輶轩语》、《书目答问》与书院诸生的 治学…	(14)
三、培养佳士，名扬蜀中…	(21)
第二章 广雅书院：传统与变异并存的产物…	(23)
一、创设之缘起及筹办经过…	(23)
二、新旧兼陈的教育教学管理…	(27)
第三章 在书院改制的历史大潮中…	(33)
一、经心书院的创办及改制…	(33)
二、两湖书院的创办和主要特点…	(36)
三、两湖书院的改制及历史意义…	(40)
第四章 人才观和荐才方略…	(44)
一、动态的人才发展观…	(44)
二、荐才方略的双重特性…	(46)
第五章 近代普通教育的开拓者…	(56)
一、发展普通教育的基本构想…	(56)
二、创办各类普通教育的实践…	(58)
第六章 近代师范教育体系的确立者…	(67)
一、论师范教育的层次性和师范性…	(67)
二、兴办各类具有近代学校性质的师范学堂…	(70)

三、对教师职业的尊崇·····	(76)
第七章 近代留学教育的新视野·····	(81)
一、留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81)
二、倡导留学教育所导致的历史效应·····	(90)
第八章 对近代实业教育格局形成的贡献·····	(93)
一、在农业和工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94)
二、实施方言教育面面观·····	(101)
三、促成实业教育整体功能的显现·····	(109)
第九章 涉足军事教育领域·····	(112)
一、“外患迭至”压力面前的理性反应·····	(112)
二、关于军事学堂的生员、师资和课程的主 张·····	(115)
三、种豆得瓜的奇异社会效果·····	(120)
第十章 改善办学条件的若干努力·····	(123)
一、引进外国新式教科书·····	(123)
二、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教育经费的筹措 与使用·····	(126)
第十一章 变事与变制：会通中西的尝试·····	(136)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内涵及分析·····	(136)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教育意义·····	(142)
第十二章 走向近代化——晚清重大教育兴革的 主持人·····	(146)
一、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废止·····	(146)
二、参与制订近代学制·····	(152)
三、为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奠基·····	(164)
后 记·····	(170)

导论 一个对近代教育产生 重要影响的封建权臣

张之洞(1837—1909年)，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督粤时为表示不与人争名争利，特取张曲江“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诗意，自号“无竞居士”，又以在粤创办广雅书局及广雅书院，故又号“广雅”。后出任湖广总督，将自己在武昌的官邸命名为“抱冰堂”，晚年别号“壶公抱冰”。他去世后，清王朝追谥“文襄”，故又有“张文襄公”之称。

张之洞5岁起入学塾读书，9岁读完了四书五经，接着学作诗和古文。他读书用力甚勤，12岁时就出了一本诗文集，14岁考取秀才，15岁在家乡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27岁参加殿试，以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从此踏入仕途。张之洞在治学和为官方面深受其父张铨和业师的影响。张铨少孤贫，力学致仕，官至贵州兴义府知府，署贵东道。张铨因早年科场不得志故寄希望于子女。他十分重视对张之洞的教育，黔中僻远，难得书籍，张铨竭尽俸酬购书数十橱，要求儿子于日课之外随意阅读。他认为：“姑令纵读，不解无妨，浸灌既多，长大后自有解者。”①又对儿子说：“贫，吾家风，汝当力学。”②1856

①②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

年，张镓在贵州镇压苗民起义时病卒，临终前告诫诸子：应力学问，树功名。张之洞幼承庭训，耳濡目染，青年时代就立下了“仁厚尊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的志向。业师对张之洞一生的影响亦很深刻。张之洞13岁以前受业于何养源、曾搢之、王可贞等人，14岁后受业于丁诵孙、童云逵等人，业师中有生员6人，举人4人，进士3人。又曾从其父的挚友胡林翼、韩超受业。这些人都是科场的高手，向张之洞传授的是传统的经、史、子学、宋明理学、小学、音韵学、诗文策论等。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张之洞打下了日后经邦济国的实学基础。张之洞官至显贵后，仍然念念不忘业师们，尤其是胡林翼和韩超对他的培养，赋诗云：“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①表达了对业师的景仰之情。

同治六年（1867年），张之洞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主持浙江乡试，取用了一批朴学之士，著名者有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等，这批人后来在晚清社会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8月9日载：“今年张香涛以名士来浙江主试，可谓乡邦之幸。”显见此举受到浙人欢迎。

1867年底，张之洞简放湖北学政。他为了实现其培养人才理想，除通过考试在湖北各属选拔“知耻廉正”之人外，还选送各州府的优秀生员入湖北江汉书院学习，并建经心书院，选各府尤异者数十人就读其中。张之洞政绩颇佳，曾国藩赞扬说：“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②因劳顿过度，张之洞在

① 《谒胡文忠公祠二首》，《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六。

② 曾国藩《与许仙屏书》，见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一。

离鄂前称：“人言为官乐，那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①其用心之专，治事之勤，从这首诗中可以想见。

1873年，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简放四川学政。在川期间，他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攻讦、冒籍、枪替、拉槓等恶习，雷厉风行加以整顿，科场风气为之一变。他又以成都锦江书院造就人才不广，商请四川总督吴棠于1874年创建尊经书院，择郡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他还亲自制定书院的规章制度，并于公务之余，到书院为诸生上课。他撰写了《轺轩语》、《书目问答》两本书，指示士人以读书之法。四川学政这一职务收入一向丰厚，因张之洞为官比较清廉，曾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去任时，竟无钱治装，惟有出售所刻万氏十书经版，始得成行。

1877年初，张之洞回到北京。此后，当了五年京官，一直升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内阁协同批本。在这段翰林生涯中，张之洞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对外反对侵略，对内纠弹朝政，揭露时弊，与宝廷、陈宝琛和张佩纶等人一道被称为“清流派”。1879年，崇厚屈从沙俄，签订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的里瓦基亚条约，当时任司经洗马（掌管图书经籍）的张之洞，地位并不高，但他前后上疏20余次，坚决要求斩崇厚，毁俄约，表现了爱国主义的立场。

1882年元月，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社会十分黑暗。张之洞上任伊始，即提出了激浊扬清，整顿吏治，垦荒积谷，开源节流，整理财政等治晋办法。同年7月26日，张之洞又上《整饬治

①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

理折》，指出治理应办者计有20事，而最重要的是，劝垦荒、清丈土地、裁减差徭，禁种罂粟、裁革公费馈送、裁抵摊捐、建仓积谷、清理善后库款8事。同时改良山西科场制度，裁免民间应派各项，大修贡院，建两廊70余间。经过张之洞大刀阔斧的改革，山西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与此同时，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1883年，他创办令德书院，选取一批聪颖少年专治经史古学，这所书院成为山西省培养专门人才的摇篮。同年12月，他制定了《推广兴学办法》，要求各地减社钱以广义学，筹经费以修书院，去棚费以汰积弊，免差徭以尊学校，重岁贡以劝来学，戒鸦片以作士气，严教官以端表率，裁陋规以恤寒素，清学田以复旧章，整武校以资练习。他自己身体力行，每至一处，均注重当地之教化，对培育人才尤其不遗余力。在山西短短3年，张之洞循儒术经常之规，走的大体是中国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路子，但也开始萌发了洋务思想。他聘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顾问，在山西兴办了一些洋务项目，如设教案局、洋务局，筹办山西练军，设立桑棉局等各种实业机构，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张之洞成为洋务派的开端。

1884年，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起用冯子材等将帅，精心布署，击败侵略军，获得震动中外的镇南关大捷，由此受到热烈称赞，冠望一时。督鄂期间，张之洞“舍理而言势”，在原有洋务局的基础上改设“办理洋务处”，广罗洋务人才，兴办了一系列洋务项目。如聘请香港工匠，造成浅水轮船4艘，命名为广元、广亨、广利、广贞。又建出海兵船4艘，命名为广甲、广乙、广丙、广丁，增强了广东水师的实力。鉴于发展海防，所需弹药甚多，仰给于外人，时感不便，又于1886年10月创办了广东第一个近

代化机器工厂——枪弹厂。试办之初，日造子弹2000粒，以后每日可造8000粒。他广集资金，筹建枪炮厂（后移设武昌），并提出“唯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①于是开始筹设织布局。他还以中国每年需向外国购买铁制品为数颇巨，乃上疏筹设炼铁厂。为改变外洋银元大量输入，充斥市场的局面，于1889年5月，建成机器铸钱厂，时人称中国之有银圆者自张之洞启之。作为与外界接触较为频繁的两广地区的总督，张之洞在任内妥善办理了对法外交、港澳事务以及向东南亚各国及美国交涉保护华侨事宜，这些都明显带有抵御外侮、保护民族利益的倾向。张之洞认为，当时急务，首在储存人才，为此，将广东省城博学馆旧址改建为水陆师学堂，聘洋将洋弁讲习水战陆战之法。还开设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并给予极大的关注。张之洞在粤六年，锐志兴革，逐步由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化。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07年，其间除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制定学制之外，督鄂长达17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久的一人。他在湖北设立了全国著名的铁政洋务局和麻纱丝麻四局等洋务企业，提倡实业，整顿财政，扩展交通，改进武备，创设警察制度，使湖北成为当时全国洋务活动的一个中心地区，张之洞一跃而成为唯一能与李鸿章抗衡的洋务派首领。此后，清末各省推行“新政”皆取法湖北。为了适应洋务活动对人才的需求，他在湖北地区改书院、办学堂、倡游学、办报纸，文教事业极其兴盛。他率先在湖北设立学务处，作为总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关，还积极兴办和改制了一批书院，创设了

^① 《拟设织布局折》，《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十六。

一批新式学堂。他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和工程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师范学堂有：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师范学堂等；普通学堂有：湖北初等小学、湖北五路高等小学堂、湖北文普通中学堂、湖北文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妇幼学堂有：湖北敬节学堂、湖北育婴学堂、湖北女学堂等。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张之洞亦十分热衷。经张之洞惨淡经营，湖北成为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基地。

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曾两度署理两江总督，每次时间虽然不长，但都有所兴革。第一次是在1894年，因两江总督刘坤一暂时离任赴京，清政府令张之洞代为署理。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前夜，张之洞到任后，立即督饬长江下游防务。战争爆发后，张之洞积极向前线派遣兵力、输送饷械。甲午战败，中国割地赔款，对张之洞思想影响很大，他提出：必宜趁一年之内，于海疆各省，效德人练兵之法，募洋弁洋将，训练洋操军。为此，于1895年在江宁成立了自强军。这支军队全面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建制，除拥有通常的马、步兵外，还设置了炮兵和工程兵。自强军训练有素，一些检阅过自强军的官员认为，举目江南诸军，无如自强军。张之洞还在江宁创办陆军学堂，选择13岁至20岁的“聪颖子弟”150人入学，聘请德国军官5人充任教习，为新式军队培养骨干。张之洞还积极兴修铁路、振兴实业、设商务局，促进商业经营活动的开展。同时，又筹拨巨款，疏浚江苏、安徽、河南三省河道以济三省之民。在教育方面，他在江宁创办了储才学堂，改金陵同文馆为初等储才学堂，并在陆军学堂内附设铁路专门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第二次

是在1902年。当年10月，两江总督刘坤一病故，张之洞于11月5日抵江宁接署两江总督，次年3月即返回湖北。因为时甚短，唯补苴幽逸，亦未尝有赫然之举动。主要措施有：与英国银行议定沪宁铁路借款合同、整顿江南制造局、整顿淮盐积弊、设两江学务处、奏设三江师范学堂、与袁世凯会奏变通科举并分科递减科举取士之数、派水陆师学生分赴英国、德国留学。暂署两江是张之洞教育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他追求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张之洞第一次暂署两江总督至返任湖广总督前后，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张之洞曾附和维新派，资助强学会，捐款时务报。然而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同意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任何实质性改革。在百日维新的帷幕即将拉开之际，1898年4月，他发表了《劝学篇》，全面论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反对君主立宪的变法主张。1900年8月，他把唐才常的自立军投入了血泊之中，暴露了反对变法维新的面目。同年，面对英俄等国直接派兵侵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压力，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提出了“东南互保”，这一举动迎合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摆出了革故鼎新的姿态，宣布实行所谓新政，改革教育制度乃是新政中一个主要的内容。1903年，张之洞受命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在这之前，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廷接连提出了有名的会奏变法自强之疏以及其他建议，并促使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

1907年8月，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管理学部事务，总揽全国教育大权，成为晚清的重臣。到任后，张之洞提出

化除满汉畛域、安定因慈禧和光绪相继死去而出现的崩殂之朝局，并作出襄赞立宪的姿态。他还负责总管京汉铁路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的事务，反对铁路商办，维护铁路国有。他领导学部颁发命令督责各地推行新学制，奏准设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和京师图书馆，并进一步完善学制。他以抱病之躯，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1909年，张之洞卒于京师，终年73岁。临终前对陈衍叹曰：“国运尽矣，冀一悟而未能也。”^①并告诫子弟“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又曰：“吾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己。”^②张之洞死后，清政府派载涛前往奠祭，各国驻京公使亦前往奠祭，极尽哀荣。1909年12月，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将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兴学育才的事迹宣付史馆。1910年10月，两江总督张人骏奏请于江宁建立张之洞的专祠。同年11月，又有人奏请于武昌捐建张之洞的专祠，以资纪念。张之洞死后不到两年，武昌起义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我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表明尽管张之洞生前“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③但毕竟无力回天。孙中山于1912年4月在武汉谈到张之洞时指出：“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④

张之洞的著述大多已收入《张文襄公全集》，共229卷。其中《劝学篇》是他“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代表作。《轶

①②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

③ 甘鹏云序，见胡钧《张文襄公年谱》。

④ 《时报》1912年4月15日第3版。

轩语》、《书目答问》和《抱冰堂弟子记》以及奏议、公牍等，也都是研究张之洞的思想与活动的重要史料。

具体社会运动过程展示着历史的逻辑，张之洞从一个具有典型儒家心态的清流党人转变成为洋务派在后期的最大的代表人物和封建末世的一代权臣，其在社会运动过程中所作所为也反映和验证着这种历史的逻辑。诚如章开源先生所指出的：“张之洞以落后的起点，蹒跚的步伐，稍稍顺应潮流有所前进。但他在大量举办洋务新政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沉重的封建传统包袱又使他对较为急速的革新望而生畏，而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则更为痛恨。他终于只能成为清朝的张文襄公，并且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对立面了结自己的一生。”^①保守与进取并存是张之洞与晚清一些封建官员所共同具有的特性，这使得他们的政治性格极为复杂。对张之洞来说，传统与近代化的矛盾在其行动和思想上的表露较之其他人更为明显和尖锐，不可能用一个简单公式来概括。因此，称张之洞是一个过渡时代的重要的过渡型人物是十分贴切的，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张之洞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相始终，他的教育活动也几乎与中国近代教育史相始终。他被称为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大兴革都与之有密切关系，有的更是在他的直接参预和指导下完成的。他的思想和主张深刻地影响了清政府的教育决策，左右了清末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他不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尽管传统与近代化的矛盾也贯穿在张之洞众多的教育活

^① 见章开源为冯天瑜《张之洞评传》所作的序言，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动和浩繁的教育言论中，给中国近代教育的许多侧面烙上鲜明的印记，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这不应影响我们对他的基本评价。从历史的角度看，张之洞采取的一系列教育措施具有积极的作用，加速了中国教育变革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一位名人曾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同样，讲到近代教育，不能忘记张之洞。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出客观论定，这是历史赋予教育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

第一章 在尊经书院的早期教育活动

1873年，正值盛年的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上任伊始，即开始关注当地的教育事业。在他的倡导和四川总督吴棠及地方士绅的襄助下，于1874年在成都建立了尊经书院。

一、囿于传统的办学特色

尊经书院设在成都文庙西街，堂宇宏深，规模较大，中厅有“石室重开”匾额，大门刊“考四海而为儒”、“伟群龙之所经”的联文，反映了创办者欲仿效汉代文翁兴办石室的事迹，在四川复兴儒学以敦礼仪兴教化的思想。书院内还建有尊经阁，内藏丰富的图书典籍及中西时务书报、挂图、仪器、标本等。张之洞本人捐献了数千册书籍。书院分设经术、词章两科，由张之洞选择郡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当时，有人认为张之洞创办这所书院是为了“振恤寒士”，收容一部分贫苦读书人并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但张之洞本人却认为自己并非“振贫之官”。他指出：“全蜀学生三万人，院额百人，振百人遗三万，何益？月费岁止数十金，即益以膏火未见能起其贫也。”^①他明确表示，办尊经书院是为了培养人才，推进教化，弘扬蜀学。历史上蜀中人才济济，蜀学在国内享有盛誉，张之洞曾列举并赞扬了一些成就突出的四川人。如汉代时，四川曾出现被称

^① 《创建尊经书院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三。

为“经之宗”的郭舍人、张叔、司马相如、扬雄等著名学者。唐代曾出现过陈子昂、李白等大文豪。宋代时，王当、王偁、李焘、李心、范祖禹被誉为“史之良”，苏洵、苏轼、苏辙、苏迈、苏过等人也以文学著名于世。元代著《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的虞伯生，明代著《升庵集》81卷的杨慎，也都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盛名。但是到了清代，在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中竟找不到一个四川人，《皇清经解》曾收入了135位学者的398部著作，其中没有一个是四川人，这表明，四川在全国的学术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历史的特异现象，也引发了张之洞对人才培养问题的深深担忧。他通过走访、察勘，认为人才匮乏，学术低下，除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乃所致外，还与四川的文风凋弊，文教事业大大落后于江南地区，少有文人在真正研究学问有关。省会成都仅有一所锦江书院，是当时全川的最高学府，但规模狭小，设施陈旧，学生以学八股制艺为主，以参加科考为主要目的，以致学生除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业不知《史记》、《汉书》，这样的书院显然无法承担起为四川省培养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治世人才的重任。加之四川地处西南，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是一个大省，但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开发却大大落后于中原及沿海各省。人才匮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四川走向近代化。有鉴于此，张之洞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表示要整饬士习，培养人才，剔除弊端，体恤寒畯。他认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创办尊经学院，教授经世致用学说，使学生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经辗转流衍，使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才。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从而获得较大的教育效益，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观点与他后来提出的“人材之成出于学”、